

13.04

莆田文史資料

第 四 輯

(内部发行)

8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莆田文史資料

第四輯

24149/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福建省涵江第一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莆仙早期革命活动	黄一石(1)
翰侯自传	陈国桢(16)
先兄陈翰侯烈士自传跋	廖 华(23)
陈国桢烈士遗诗	廖 华(26)
陈国柱同志诗钞	林祖韩辑校(35)
重访战地	蔡 园(54)
蔡园同志诗稿	蔡 园(60)
两次难忘的革命活动	王 福(69)
蔡明善同志和我在狱中斗争的经过	
.....	戴梦全(74)
解放时《告涵江父老兄弟书》及其它	
.....	郑玉华(80)
莆田荔枝传入美国	黄季成(84)
《莆田县令春秋》新编(上)	文如许(88)
国民党水警总队逮捕刘佐周、陈文全 经过实况	罗文默(94)
记陈文全同志被捕释放经过	陈肇鰵(97)

“福建和平救国军”见闻三则.....	郑文义(101)
西安事变时我在日本的见闻.....	张宪章(106)
我所知道的林寿国	林耀东(109)
一九三〇年涵江镇火灾纪要.....	余济沧(112)
跋《涵江 火灾书画展览会特刊》.....	标维铨(115)
昙花一现的莆田农业职校内幕.....	黄西斋(122)
莆田田径访问团日记(下).....	宋元模(126)
莆仙戏史话谈屑(下).....	陈佳润 陈长城(143)
读者·作者·编者.....	(153)

莆仙早期革命活动

黄 一 石

第一批觉醒者

廖华同志，原名陈国柱，号子石，秘密通讯中用“梓植”代号，原籍莆田常太区（今西天尾公社下垵大队）。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党团一样），是莆田地区的最早党员。

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参加刘少奇同志领导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苏兆徵同志报告中的全国工人和工会的统计数字，就是他统计的。会后，他由林伯渠同志派去国民革命军六军三团搞政治工作。在广东惠阳训练军队时，接触了彭湃同志，了解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国柱同志参加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工作，任省委常委兼漳属的巡视员。但上述的工作时间都很短促。从一九二六年初到一九二八年夏，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莆田和仙游搞建党和领导两县的革命斗争。此后，他又在厦门、福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地作地下活动，一九三八年赴延安，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主

本文根据廖华同志一九六二年《答复晋江地委党史办的调查提纲》的回忆材料整理的。

要城市，历尽了地下工作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坐过上海、南京、北平的监牢，尝尽了白色恐怖的千危万险。为了革命，他化名廖华（取义于他的母亲姓廖，长在九华山下）。反动派的鹰犬和暗藏在狱中的叛徒迫使他还要伪装，于是他在各地的地下活动中，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都说他是温州人，因为温州人也有一部分说闽南话的。假如敌人知道他是早已通缉在案的莆田人陈国柱，早就被杀害了。斗争，入狱，出狱又斗争的长期反复的生活，给他的经历赋予传奇色彩。他和他哥陈国桢是孪生兄弟。国桢同志号榦侯，早年曾在厦门工作，解放前夕在云霄县牺牲。一对孪生兄弟，都为中国革命而鞠躬尽瘁，在革命史上是少有的。

“五四”运动后，国柱同志在莆田哲理中学求学时，看到了几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一九二一年春，他入刚创办的厦门大学读书。那一年校中的哲学教授朱隐青发起纪念“五一”劳动节，领导集体劳动，出版纪念专刊，並宣传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工人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三年，厦门南普陀寺前的厦大新盖校舍落成了，借用集美学校上课的师生，便迁移到新校舍上课。那时的“映雪楼”下，经常摆着我党出版的《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湘江评论》等杂志和《二七纪念专刊》，国柱同志是经常的读者。校中开设的社会学课，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一章。同学中只有他和施乃铸、林惠祥选读。施乃铸是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时，由邵力子和李达同志介绍入党的，是福建的第一个党员，当时他俩很接近，施送给陈几十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国柱同志都阅

读了。这时他进一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九二四年，厦大分裂，莆田人欧元怀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国柱和莆、仙及闽西的大部分学生转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同年秋季，他就在大夏入团，并在学校附近致和里一座洋房中，参加了团支部成立会。一九二五年冬，他毕业于大夏大学，由当时中共中央的袁孟冰同志（上海大学学生，江西人，他和邵式平、刘峻山都是江西的早期党员）指派他回莆、仙建党，并与中央直接联系。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他在广东作了短时间的的工作后，为了准备北伐，广东区党委拟调他仍回莆、仙工作，但须经中央同意。于是他由广州去上海找中央，与罗亦农同志接头，并经中央同意后回莆田。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经过仙游时，他曾在何应钦的司令部会见胡秉铎同志。（胡秉铎同志是何应钦的外甥，但是以后也在南京牺牲了。）秉铎对他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他在仙游到永太这一线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因为当时中央的部分同志和在广州的陈延平同志（陈独秀的长子，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知道他在莆田，因此特地找他传达中央的指示。

上海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三年，名义上的校长是于右任，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党校。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都在这里执教，培养了一大批的党团员，成为当时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成为当时上海青年学生的时髦。因此，上大的闽籍学生就有陈伯达（惠安人）、林嵩龄（莆田人）、陈嘉谟（少皋，仙游人）、张剑（仙游人）、郑傑民（仙游人，“清党”后就反动了）参加了党、团；大夏大学的闽籍学生，有陈国柱、吴世华、杨世宁、林清水、杨邦彦（一九六二年还在永安水利学校任

教，永春人）、陈兴锺、蔡珊（温州人，“清党”后成为托陈取消派）参加了；在复旦大学的有福州籍的方泗英和陈昭礼也参加了。此外，黄苍麟（莆田人，一九五〇年逝世，当时与陆定一同一支部）在交大入党。黄经芳（仙游人，号纬庭，后改名黄震）是在北京师大时与邵式平同时入党的。这批人中，莆、仙人占了七人，他们是莆、仙的第一批党团员（注一）。

火 热 的 斗 争

一九二六年初春，国柱同志回莆田后，任哲理中学和省立第四师范教员，九月，兼任涵江中学和莆田公学教员，很快地培养了陈天章、张如琦、王杞修、陈兆芳、吴梦泽、吴承斌、陈德来和永春籍的陈其挥、德化籍的吴邳治参加了党团；省立第四师范的郭寿奎（化名谢刚，一九三二年春在仙游县委书记任内牺牲）和永春籍的李文墨、林珠光也是他培养而参加党团的。一九二七年初，他在莆田站不住了，转移去仙游，就聘于仙游县中和道德女子中学，培养了王定清（号静圃，化名吴梅、王于洁，一九三七年六月在福州牺牲）、许淑珍（以后脱党，闻抗战时任“国民兵团”伪职）、林步云（化名陈博）、王××、林锦棠、林步庭、南区的郑纪（以后成为土匪，被林秉周枪决）、东区的郑纪（化名郑珍、蔡珊，不是温州的蔡珊，后病逝）等二十几人入党。

一九二六年，莆田先后建立了东门外的坂尾支部、涵江支部，广业支部、常太支部、郊下（属从前的北路区）支部。根据当时福州党的负责同志方泗英（方尔颢，字芳草）的意见，莆田成立了县以下区以上的特区委，国柱同志任书记，委员吴梦泽分管

广业区的工作，黄苍麟分管涵江的，林嵩龄分管郊下的。但是，苍麟和嵩龄只教书，不工作，象挂名党员；吴梦泽、陈兆芳等则开始下乡搞农民工作。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到达仙游时，陈嘉谟用签名方式征求党员，于是仙游的“乌派”分子（注二）纷纷混入党内，招摇市上。“清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要肃清共产党的说法）一来，他们如鸟兽散。这些人如郑傑民、张兆焕、张驰、李果、陈嘉谟等都是政治掮客。国柱同志在仙游建党时，对他们都不承认，从新培养了上述的二十几位党团员，并根据国共分裂后党的决定，成立仙游县委，他担任县委书记。陈德来后来消极了，也不承认他是党员。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全省有党组织的，除福州、厦门之外，只有闽西的龙岩、永定，闽南的漳州、石码和长泰，闽中的莆田和仙游。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前，北洋军阀董胜标统治莆田时，哲理、四师和涵中就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国柱同志在哲理建立了我们的党团混合支部。三月间，国柱同志建立了莆田国民党筹委会。郑炳炎在上海时是国民党的右派，回莆田时转为左派。他和郑秀毓、郑春荣、陈震、曾天毅（仙游人，哲明小学教员），以及公学派的一些人，形成莆田国民党的左派。他们也要筹备国民党党部。但是没有群众，找国柱同志要求合作，他同意了。砺青派的国民党右派陈乃元，何子扬、林朝章等也要求合作，被他拒绝了。当时，因为林嵩龄同志的父亲林香宇，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是砺青派的领袖，因此，也曾经考虑同陈、何等的合作问题。但是因为一者：陈、何本来是宋渊源和张贞的闽南民军中的政客，老奸巨滑；二者：张贞、叶定国的军队到达莆田后，勒收

苛捐杂税，民众憎恨；他俩依附于张、叶，名声太臭。因此，我们坚决不同他们合作。左派得到我们的合作之后，到处宣传国柱同志是莆田国民党的总负责人。右派因投机未遂，老羞成怒，由林朝章（号宪文）向董胜标告密。幸好国柱预先得到消息，隐避在莆城北河后塘方家，才免遭逮捕。他因此服从莆田特区党委的决定，离开莆田去广东工作了一个短时间，八月，又服从广东区党委的意见再回莆田。九月，国民革命军到达莆田时，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开了。但是右派仍不甘心，又造成“跳鼓楼”的事件。仙游的陈炳中夤缘时会，从何应钦东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党员，永定人）处骗得政治监察员的名义后，招摇撞骗，得意洋洋。一九二六年曾经密告、陷害国柱同志，是更坏的政治掮客。他和林步堂（仲仁）都属于极右的孙文主义学会，连右派都不如。他被仙游民军吴威的下属枪决，是仙游的“乌派”和“东乡派”斗争的表现。

国民党莆田县党部成立后，我们党的组织有党支部、团支部，也有党团混合支部（一九三八年，延安的中共中央决定：凡一九二八年以前入团的，都承认为党员）。党团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区分部或民众团体中，同左派一起活动时，都以自己的职业或其他名义出现，不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分。当时，曾经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通过选举，我们的党团员陈天章和宋耀华等同志当上了委员；省党部（左派李培桐、马式材等在主持）后来还加委宋耀华主持莆田县党部的工作，他一直活动到一九二九年；“清党”以后，在国民党基层活动的大部分党团员都安全无事。上述的情况，就是党团员不公开身份的良好

效果。当时我们的党团化名“读书社”，称国民党为“民校”。国共分裂后，改称党为“大学”，团为“中学”。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叫“联合战线”，不叫“统一战线”。党团员要作两套的活动：一套是在国民党或民众团体中的，另一套是自己的党内生活，虽然那时的支部会议不很经常举行。可以说，那时的国民党只是个躯壳，血肉和灵魂是我们和左派。如果没有我们党和南方各省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北伐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当时的党团分工，是党管农民工作，团管学生工作，陈天章同志和翁祖武、陈德来就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那时莆田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店员，人数少，作用不大，又操纵在流氓（雄帮）手中，因此我们不重视工运。对于妇女运动，我们是重视的，负责人是李培兰、郭晓云和宋耀华的爱人吴鸿莺。莆田的学生联合会，本来被豪绅子弟所掌握，天章等同志通过团的活动，把他争取过来，成为我们的学联，属福州学联领导。因此，莆田各中学的学生，大多数成为左派。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张贞部到达莆田时，我们举行祝捷大会，由国柱同志主持，社会各界团体都参加了，进城参加大会的农民达十几万人，是全省最多的。因此引起右派的害怕和忌恨，这是我们从前的农民工作的效果。那时莆田各区，大部分有农民协会的组织，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仿效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的，会旗和印章的样式也是海陆丰寄来的。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就是我们领导农民协会搞起来的。那时期莆田的农民运动，真是浩浩荡荡和轰轰烈烈。省党部的左派李培桐和马式材同志，开办全省党务训练班时，我们派了天章、兆芳、德来、祖武和永春的其挥同志去受训。天章等同

志回莆后，都参加了莆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

因为当时党内生活很不民主，很少学习和分析政治形势，重要文件看不到，因此对于国内时局的变化，大家都不大了解。“马日”政变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清党”时，我们莆、仙的同志还懵懵懂懂和麻痹大意。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傍晚，国柱同志在东门外坂尾村嵩龄同志的家中。时局紧张，风云变色，莆田的右派已经密令逮捕他，他还大意地要进城。嵩龄同志比较警惕，拍桌子警告他，才勉强把他留住。就在那天晚上，右派爪牙马秉彝带军队去哲理宿舍要抓他，抓不到，只搜去一枚“莆田县农民协会”的印章。第三天，国民党召开了“拥蒋护党”大会，陈乃元的爪牙郑兆俊和郑云龙成为“清党”委员会的委员。国柱、嵩龄和左派的郑炳炎、陈震、曾天毅等从此隐藏或逃亡。但是，大多数的党团员仍然继续活动。四月二十九日，仙游也开了“清党”大会，宣布通缉共产党员，但是通缉名单上开列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乌派”分子郑傑民、张兆焕、李果等。他们是“变色龙”，是政治掮客，有恃无恐，逍遥自在。仙游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国柱同志新吸收的，而且多在乡下，反动派是若知若不知的。

武 装 斗 争

“清党”后的一九二七年六月，国柱同志和杨邦彦由上海坐船到武汉找中央，住在中央设立的、收容各地逃亡同志的招待所中。当时的时局瞬息万变，北伐军已经打到河南、郑州、开封，并获得大捷，但我们的蒋先云团长牺牲了。夏斗寅部阴谋叛变，

幸好叶挺同志带来一团人，打败了夏部，武汉才转危为安。不久，听到宁、汉将合流，汪精卫与蒋介石要联合反共。在武汉的中央作了应变措施：把集中在武汉的大部同志，疏散去各地工作，派一部分同志去苏联学习。任弼时同志在招待所中同陈国柱、江董琴的弟弟（高脖子，破嘴唇）和陈少微同志谈话，派他们回福建，参加福建临时省委的工作（少微同志，以后化名陈明，抗战后随军进山东，在军政大学中任职，一九四〇年病逝军中）。他们由武汉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时，国柱同志听到“八·一”南昌起义和起义军向南方活动的消息。他回到厦门，住鼓浪屿的秘密机关时，才听到“八·七”会议召开的消息。几天后，中央来了一个通知说：“我们的军队向南方前进，决定国焘、恩来、代英、和森、太雷、夏曦等随军南发……”这批同志是当时的中央委员，组织前委（前线党委）随军作战并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国柱同志参加福建临时省委的工作约两个月后，又被派回莆、仙，并在仙游一面隐蔽，一面领导仙游的工作。

莆田“清党”以后，反动派只占据莆城的国民党县党部，下面的不受影响。因为各区分部本来未挂牌，在区分部活动的团员同志，一面回校上课，一面秘密活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们的党团员才全部退出国民党，开始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但是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交通”不便，消息不灵，同志们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使福州的党遭受重大损失。福州举行“拥蒋护党”大会时，我们的个别同志还鲁莽地去参加，以致在会场上立即被推出去枪决。方泗英（方尔灏）同志在街上被捕，同罗扬才、杨世宁和一位女同志也同时牺牲。

北伐战争以后，莆、仙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民军运动。民军的头目多系豪绅、地主或兵痞、流氓，但是贫困的农民也参加。当时的农民极端憎恨苛捐杂税，因为参加了，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敲剥。一九二二年，国柱同志曾在常太区组织学生会，反对盐捐，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迫使北洋军阀的王团长取消盐捐。当时的斗争，搞不好会被杀头的。学生会又兴办义学，教农民读书识字。这次斗争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作了基础。“清党”后，笏石区的珠墩、前沁一带的农民听到右派向我们进攻，占据了莆城的县党部和农民协会，激起了义愤，加上反对盐捐，就爆发了斗争。这个斗争是农民协会副委员长董玉书同志领导的，我们无力支援，才被右派政客伺子扬镇压下去，被杀害了两个农民。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仙游南区的郑纪，搞到二十几支枪，但是不听指挥，当了土匪，被枪决了。一九二八年春，负责仙游县委工作的吴梅同志和东乡的郑纪同志等，领导仙游东区各乡的几千农民游行示威，反对浮收鸦片捐，向烟苗捐承办员陈坤生清算。县城的学生，在我们的领导下，也举行游行示威，捣毁禁烟局（反动派要当婊子又要竖贞节坊，禁烟其名，浮收鸦片捐其实）局长王云纲的住宅，反动县长黄裳元吓得从县府后门溜走。本来我们希望把这一斗争引向武装起义，但因为国柱同志当时不能露面，吴梅等同志的经验又不足，才会被军阀林寿国镇压下去，黄金秀同志被枪决（群众因为他面如粉李，绰号叫“落李仔”），吴梅和郑珍同志被通缉。一九三〇年，陈其挥同志和李文墨同志（后来牺牲）曾在永春湖洋领导武装斗争，也因为经验不足，被军阀陈国辉镇压下去（其挥同志被通缉后，逃亡去马来

亚)。

一九二七年夏，我们在广业的夹滢附近，抓了一个土财主，得款四百元。想不到这个土财主是土匪出身的，熟悉广业地区的地形，眼睛虽被包住，还能认出地方。事后，密告反动政府，率兵来围。梦泽同志因此破家荡产，纪修同志的家被烧，我们得不偿失。一九二八年，国柱同志曾经派仙游东区的郑纪在笏石的店头（今篁山大队）搞武装斗争。但是他不听指挥，失败了，（一九三三年，他后来因肺结核和麻风病死去。在仙游同我见面了一次）。一九二八年夏，国柱服从党的决定，第三次长期地离开莆、仙，去厦门的福建省委报告后，转往上海找中央，并在上海作地下活动。他离开后，莆田成立中心县委，领导仙游县委的工作，中心县委书记是黄经芳，县委书记是吴梅。约在这个期间，梦泽同志曾经把工作发展到福清的东张，在那里播下革命种子。抗战后翁洪镗、陈建新带领的新四军特务连中，除莆、仙人外，还有很多的福清人，其起源就在此时。

几 点 总 结

（一）莆、仙建党以后，经费完全没有来源，都依靠自供自给。北伐军未入闽时，不仅要掏腰包，而且要掖着脑袋干革命。国柱同志当时的每月收入九十余元，除给他母亲十元外，其余的都花在党的活动中，逃亡时的旅费也是自己的。北伐军入闽后，才有每月四百元的办公费，才在“鼓楼顶”办伙食和办公，大家吃大锅饭干革命。国共分裂后，我们的经费又困难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退出国民党以后，有时在武装斗争打击豪绅中得到一

些钱；武装斗争失败后，又困难了。

（二）建党初期直到一九三〇年八月，我们的干部都是学生出身的（只有陈蒲川同志是农民），毫无斗争经验。国柱同志认为他自己也没有经验，工作作风是事务主义的，整天忙忙碌碌，没有学习理论，有时连上级来的重要文件也没有空来看。因此国共分裂后的几次武装斗争都失败了。

但是莆、仙党也有特点，根据陈国柱同志的总结：

〈1〉、一九二六年三月前，就发展了大批党团员并开始建党，这是福州、厦门以外，全省建党最早的县份；

〈2〉、建党以后，莆田就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反对盐捐，十几万农民进城参加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仙游举行了反对浮收鸦片捐的激烈斗争，吓跑了反动县长，这也是全省少有的；

〈3〉、除闽西外，全省最早搞起了武装斗争的是莆田和仙游。闽西各县地处闽粤赣三省边区，地理条件较优越，靠近江西苏区，红军入闽西支援，党的领导较强，因此很快打出一大片根据地；莆、仙是福建的“心脏”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强弱相差很大，党的领导较弱，干部经验较差。因此，武装斗争屡起屡仆，屡仆屡起。从国共分裂后到解放前的二十二年中，武装斗争总是绵延不断，时起时伏或此伏彼起，总是顽强地斗争下去；

〈4〉、干部多系知识分子，入党以后，多数人坚持奋斗，至死方休。陈天章、陈兆芳、张如琦、吴承斌、王于洁（吴梅）、陈汝舫、林硕、郭寿鑫、黄元燊、雷光熙、黄瑞麟和罗元祥（郑傑）等，都是有名的烈士。还有不少烈士名字埋没了；有的烈

士，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身世。比方，吴得标同志，一九四〇年冬的“皖南事变”中，在盱眙被惨杀，现在莆、仙人民知其名的很少，他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人也不知道。因此，亟须通过调查和访问，重新编写莆、仙革命烈士传略（这是国柱同志一向对我们的殷切期待）。

〈5〉、早期的党的干部，虽然有的消极和脱党了，在旧社会的长期生活中，有了这样的那样的错误，但是终其一生，没有干过破坏党的坏事，如黄经芳和黄苍麟同志。他们和漳州的郑超麟比较就好得多。超麟虽然曾经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是福建的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时回国，一九二九年当过中央巡视员来福建视察。但是后来却参加托（托洛茨基）陈（陈独秀）取消派，是党内分化出去的最坏的叛徒集团中的一人，解放后在北京被看押。

附录：

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

莆仙党的负责人及分工情况表

（一）

前哲理中学党团支部（一九二六年三月）

书记：陈国柱 组织：陈天章 宣传：陈德来（以后消极脱党）

（二）

莆田特区委（一九二六年八月至年底）

书记：陈国柱 组织：陈天章 宣传：林嵩龄

农运：吴梦泽 林清汉 青运：陈德来 翁祖武 邱光非